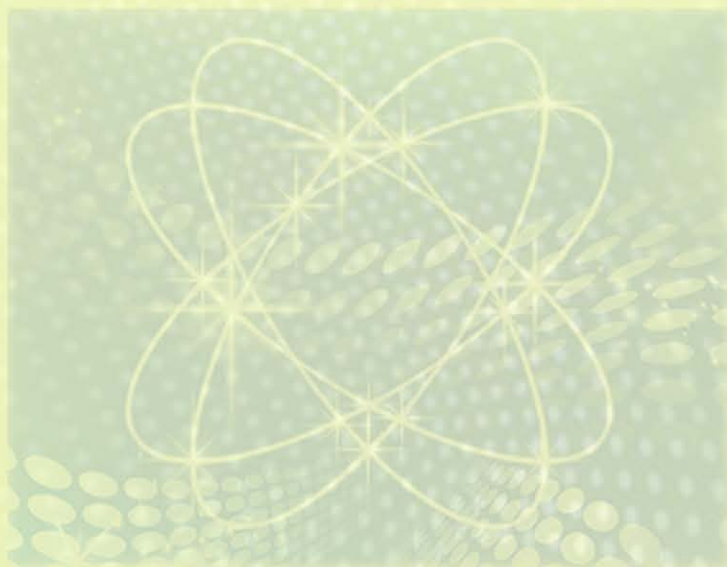


群众路线



中央编译出版社

导 言^①

人权的思想应该说是非常古老的，但人权概念及其学说却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即出现于 17 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从 17 世纪到今天，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已经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7 世纪至 19 世纪上半叶，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下半叶。在这三个阶段中，人权学说两起一落，形成一个马鞍形。第一个阶段是西方人权学说起始与繁荣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衰落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繁荣阶段。这个马鞍形的出现是与近现代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相适应的。

在第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推动下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凯旋前进，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国不断取得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启蒙运动的思想 and 理论正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反映和精神武器。如果要用一个名字来概括启蒙运动的思想，那就是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它是批判封建主义的利器，也是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精神手段。人权学说是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道主义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对人权的尊重。

历史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接近完成，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也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这些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抽象人道主义及其人权学说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日益为先进知识分子所认识，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正是摒弃和批判、了抽象人道主义和人权学说，才创立了唯物史观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阶段的这种经济政治形势导致了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权学说的研究再度形成高潮，这也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决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两个战场上，死亡了四五千万人，特别是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空前的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战争的幸存者和一切善良的人们每念及此无不深恶痛绝。这是人权研究再度高涨的社会根源之一。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努力，许多国家的经济不但恢复了，而且大大增长了，但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战火不断，灾害频繁，人民不得温饱，甚至生存也没有保障；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人权遭到侵犯的事件也层出不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人权研究再度高涨的社会根源之二。新的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工

^① 《西文人权学说》导言由黄树森撰写，全书由黄树森、沈宗员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2 月出版。

农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财富，使地球上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过去，但生产的无节制发展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资源枯竭，空气，海洋、河流、土地严重污染，植被破坏，森林减少，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总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是人权研究再度高涨的社会根源之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出现以来，资产阶级就攻击它违反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及其活动更被扣上反人道主义的帽子。二战以后，发达国家政府继承了这种做法，继续举起人权这杆旗子，以国际人权卫士自居，推行“人权外交”，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促使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这是人权研究再度高涨的社会根源之四。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理论界逐渐认识到人权并不是资产阶级概念，而有一定的普遍性，过去只看见人权的阶级性，这是片面的，现在对人权应展开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否则难于反击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同时还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应该大力加以改善，这是人权研究再度商涨的社会根源之五，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根源。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差异，。这三个阶段的人权学说状况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特点，由于本书不包括第三个阶段，下面分别谈谈前两个阶段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的人权学说有以下特点，

第一，人权学说具有综合性和笼统性。启蒙时期的人权学说已经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权思想的素朴性，而是一种自觉的系统理论，但当时最著名的人权学说如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或人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都还没有形成严密完整的人权理论，而是包含着人权理论在内的综合性社会理论，其组成部分还有哲学、社会学、国家和政治学说、伦理学，法学等。诚然，在今天，这些学科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很难截然分开，它们往往互相渗透交叉，但今天这些学科已经是按对象不同而相对区分开来的专门研究领域，不像那时那样笼统了。今天人权学说也是综合的，但它的综合性是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而那时人权学说的综合性是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的，是一门学科在起始阶段往往具有的笼统性、模糊性。因此，那时人权学说的代表往往既是政治学家、法学家，又是哲学家、社会学家。认识清楚这一特点是很重要的，它将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历史地对待这些思想家及其人权学说，• 能够从他们的宽泛的论述中剥离出他们的人权学说。

第二，人权学说具有人民性和资产阶级性。启蒙思想家的人权学说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和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需要而提出的，其阶级性是十分鲜明的，尽管他们侈谈每一个人生而具有自由和平等的人权，自称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但由于他们否认他们所代表的人群中的阶级差别和对立，鼓吹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所宣扬的自由与平

等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因此他们所说的人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人权。从本质上讲，这种人权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在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其局限性就更为明显。但是，应该承认，他们的人权学说也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即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要求，这不仅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有资格代表新的生产力，代表人民，而且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到处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的真诚的热爱和对他们的利益的捍卫。卢梭控诉封建专制制度说，“幼者号令长者，愚者领导贤者，一小撮人坐拥金城，大多数饥民无以为生，显然是与自然相违背的。”^①他号召人民以暴力来推翻统治者的暴力，认为“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动。支持他的是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力。”^②总起来说，启蒙学者的人权学说是进步的，它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也确实大大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三，人权学说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前面已谈到它同历史观的密切关系，那么指导它的历史观是什么呢？是人道主义历史观——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包含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权失而复得的历史，亦即人性的丧失与恢复的历史。各个启蒙学者对人性或人权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是不同的，但都认为人性的发展决定了整个人类历史的面貌，他们归根到底是用头脑来解释历史，陷入了唯心主义。启蒙学者的自然观往往是唯物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仍摆脱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

第二阶段的人权学说则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丧失了其进步性，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并逐渐成为攻击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工具。随着资产阶级取得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就日益加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来，19世纪上半叶就爆发过多次工人阶级的起义。人们发现他们追求的理想共和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代名词，自由、平等、人权不过是富人剥削和压迫穷人的遮羞布。启蒙学者的人权学说渐渐失去了它的全民性的光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未抛掉人权这杆旗帜，而且发明了人权学说的新的用途：露骨地用人权学说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人权学说批判的矛头从封建统治阶级转向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国家。由于国家发展情况的复杂性，有的思想家并没有失去启蒙学者所具有的风采，例如意大利民主革命家马志尼，为解放黑奴而牺牲了生命的美国总统林肯，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劳动人民

^①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下篇。

^②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下篇。

的同情和爱护，但这一阶段的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主要特色是日趋反动，以人权学说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有人在。例如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他的《劳工问题通谕》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谬误”，宣称私有制出于人类天性，鼓吹工人与资本家合作，谋求共同幸福。又如波普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国家学说根据的是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即“最无耻最野蛮的剥削时期”，他也反对用“人类自由的原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权”、“自由地缔结有利的契约”等为这种资本主义辩解，但他认为这种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完全是马克思的假设，实际并不存在，或者说，19 世纪还存在过，而现在已经为有计划的国家经济干预所取代了。但“干预主义是极其危险的”，“只有自由才是可靠的保证”。这样，波普就回到了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立场，维护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并回答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利坦是另一位公开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人权学说捍卫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是 20 世纪著名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鼓吹“以上帝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在《人权与自然法》一书中把人权区分为个人权利、公民权利和工人权利，好像他十分重视劳动人民的权利，但这种重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从看重经济技术的旧的社会主义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中摆脱出来，使“工人与雇主处于公正的关系，在雇主面前作为成人，而不是孩子或奴仆”。显然这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

第二，与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相对立，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异军突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是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启蒙学者的人权学说持肯定和赞许的态度。当他们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时，他们批判并抛弃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但并没有否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道原则。他们揭露了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阶级性，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权概念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但并没有一般地否定人权概念。他们认为，人权概念是历史性概念，离不开社会经济制度。在私有制条件下，自由、平等、人权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真正的自由、平等、人权又必须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消灭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①。这些思想为建立科学的人权学说开辟了道路。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关于人权的论述着重于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批判，而不是从正面去建立人权的系统理论。苏联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对人权的研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前没有根本改变。

第二次大战后，全世界人权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要任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82 页。

之一就是进一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权理论体系。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一任务一定能够完成，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才能完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深入研究历史上的人权学说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①

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文化，这个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农业封建文化，封建社会以前的文化已融入这个文化之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然是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根源，而且因为它的许多因素，包括进步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已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之中，否认它们的存在是违背事实的，把它们排除于中国现代文化之外是不可能的。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过去，但中国文化传统仍然存在：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不加分析地恢复整个传统文化是不对的、不现实的，置之不理也是不对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批判与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流派纷呈。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复合体，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儒家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包括儒家和以儒学为指导的各种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已有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的历史，对于把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对于历代社会的安定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其影响极为广泛深远。但儒学本身并不是一个结构严谨、思想一贯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仅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并存，而且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同在，因而儒家也分为各种门派。二是诸子百家之学，即儒家以外的各家各派，其中主要的有道家、法家、佛家的思想，其中包括历代都出现过的批孔反孔的思想家，诸子百家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儒家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三是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及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勤劳、勇敢、节俭、自强不息等优良品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些才能、智慧和品德才得以在这片不太丰腴的土地上繁衍子孙，生生不息。四是中国人民在反对剥削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培育出来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济困扶危、爱国如家、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正是这些精神因素使中国人民能够对己和、对敌狠，前仆后继地争取胜利，几千年岿然独立于世。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限于篇幅不能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下面仅就几个人们普遍关注的有争议的问题做些分析。

^①本文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第十二部分，由黄树森写作。全书由黄树森、龚书铎、陈先达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一、关于天人关系问题

天人关系这里仅指自然和人，或者说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至于其中包含的神与人的关系，后面将在讨论宗教问题时涉及。

关于天人关系，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强调天人二分，甚至认为中国主张天人合一，西方主张天人二分。天人合一导致科学技术不发达，导致人人和谐、协调；天人二分导致科学技术发达，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哲学研究》1994年第2期上，陈国谦教授的文章《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可以代表这种观点）。因此，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排除其中的神秘成分（把天理解为神）和片面性（轻视天人二分），对于建设现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提出这种观点的用意是好的，但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并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特点，片面强调天人合一未必有利于中国文化建设。人本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产生以后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环境，人与自然界之间永远处于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之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是实践与认识。无论是实践还是认识，都是对立统一，即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实践与认识的主体是人，客体是天。从逻辑上讲，二分与合一是相互依存的，互为前提的。从实际过程讲，人从自然界产生出来是分，人改造自然获得生存与发展是合，人认识自然获得真理也是合。人要生存与发展，既要与自然二分，也要合一，缺一不可。这是人类的共性，无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概莫能外。在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几种璀璨的古代文化，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但只有古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五千多年，不曾中断，靠什么？靠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成功，靠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即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不用说缺乏天人二分或缺乏天人合一，即使仅仅是强调天人二分或仅仅是强调天人合一，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都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息繁衍的历史和科学技术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不管在实践领域还是认识领域，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都是做得不错的，对今天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的是传统文化中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相统一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基本上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片面强调天人合一，如指天人是一体，人是天的一部分，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说：“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①这是一种素朴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观点。《外篇》中的思想不一定代表庄子，庄子以及道家更强调另外一种观点，即天人应该

^① 《庄子·外篇·秋水》。

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观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就包含人与自然相和谐、协调的思想，庄子把这种思想加以夸大，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①，人甚至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②，达到天人浑然一体的“无待”的境界，这就是无内外之别、高低之分、大小之异的天人不分的绝对，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只有“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这种观点当然是神秘主义的，但它强调合一，即人与自然的高度一致，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儒家创始人孔子也谈天命，但基本倾向是回避谈天，没有提出明显的天人合一观点。孟子大谈天命，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③。这就是——一种天人合一观点。他还进一步把这个思想提高到天我合一，提出“万物皆备于我”^④的命题，认为心、性、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后来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无疑也是一种天人合一观点，它带有更浓的神秘主义色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居主流地位的是把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结合起来的思想，这在儒学中特别明显。孔子回避谈天，从而也就回避谈天人关系，但人生存和发展于自然界中，绝对回避

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分析孔子的实际思想也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既肯定天人二分，又肯定天人合一的。孔子不谈天道，而热衷于谈人道，他的论说都是关于人和社会的，这其实就包含了天人二分思想。孔子虽然轻视体力劳动(樊迟问如何种庄稼和种菜，孔子回答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但他并不轻视生产。“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⑥“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⑦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家，非常重视教育，即教育学生从事认识和实践，他所说的“富之”、“足食”也就是要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富裕。总之，无论如何不能把孔子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观点简单化为天人二分或天人合一。

孟子思想中固然有强调天人合一的一面，但他主要主张还是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的结合。孟子比孔子更加重视生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⑧他还把古代奴隶制的土地制度理想化，提出了井田制的土地

^① 《庄子·齐物论》。

^② 《庄子·逍遥游》。

^③ 《孟子·尽心一亡》。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论语·子路》。

^⑦ 《论语·颜渊》。

^⑧ 《孟子·梁惠王上》。

占有与使用制度。特别有意义的是，他那时已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萌芽，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wū)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①这就是说，按自然规律耕种，不竭泽而渔（不过度用网打鱼），养林与采伐相结合，生产才能持续发展。——般认为，荀子是天人二分思想的主要代表，因为他明确提出“天人之分”。其实，从思想实质上看，他是中国古代主张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相结合的最主要的代表。他十分明确地阐明了天作为客体的客观实在性和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天人统一的道理。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②又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③这两段引文，用现代语言加以诠释，包含了以下几点思想：其一，自然现象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社会现象则是人们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其二，自然现象对人是祸是福取决于人的态度，如能根据自然规律加以改造，节约资源，发展生产，人民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其三，与其把自然界作为偶像来崇拜，消极地等待它赐福于人，何不掌握其规律，按照人的需要来改造它？此外，他也有孟子那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他说：“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④这是用思辨的语言辩证地处理了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主体利用客体，却伤害了客体，不如先使客体受益然后再利用它，这样效益会更大。主体只是利用客体，却不爱护客体，不如先爱护客体然后再利用它，这样效益也会更大。主体使客体先受益再利用它，又不如只使它受益而不利用它，这样效益也还会更大。这一段话如果把客体理解为自然界，就是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刻的哲学表述吗？当然，不能把客体理解为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可以看出，把荀子看成是与天人合一对立的、只讲天人二分的代表是不对的，他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的全面内涵是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的辩证统一，或者简单说，是自然界与人的对立统一。

古代的法家也有这种认识，韩非说：“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⑤这里实际上是把老子的消极无为思想改造为积极的无为，即遵循自然界和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及其规律而为，而不是把主观意愿主观主义地强加于客观对象，这

^① 同上。

^② 《荀子·天论》。

^③ 同上。

^④ 《荀子·富国》。

^⑤ 《韩非子·喻老》。

样就能获得成功。这种把人们从自然界区别开来、又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它是一切文化的共性，并将永远延续下去。

自然界与人或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思想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传统随时提醒我们要有主体意识，即经常意识到人来自自然界，却高于自然界，自己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首先是实践主体的客体，即人的实践对象。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人必须通过实践改变自然界，即打破原始的平衡关系，建立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人又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永远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立足于可持续发展，注意与自然界保持和谐共处的关系，而决不能以损害自然界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人。因此，任何片面性都是不对的，既不能忘记或轻视人与自然的区别，又不能忘记或轻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没有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就没有实践活动及其成功，也没有认识活动及其成功。没有实践和认识也就没有人和人类社会。总之，要在主张天人合一与主张天人二分，或在强调天人合一与强调天人二分之间区别中西文化，评价其是非得失，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会把人引到歧路上去。但是，在天人关系或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形式上，即在实践和认识这两种形式上，中西文化之间确有区别，这在下一个问题中将有所涉及。

二、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

人类有三种主要活动，即改造世界的活动、认识世界的活动和评价世界的活动，简称实践、认识和评价，或把评价包括于认识之中，简称实践和认识。这里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什么意义。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实践和实用知识，强调学以致用，而西方文化强调对外部世界的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不要求科学研究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区别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是中西思想家的科学思想，一是中西科学的实际情况。

当然不能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根本不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儒家经典《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后来朱熹加以发挥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①又如孟子、荀子、王充以及其他思想家都有许多论述，认为知识

^① 《大学章句补格物章》。

来自外部世界，应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及其他方式来获得知识。但他们更重视书本知识，更重视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更重视有实际价值的知识。格物致知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儒家圣经《论语》中有很多精彩的学习和教育思想，但很少谈到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从外部世界去获得知识。孔子教学生学习的周礼、经典都是间接知识。不仅如此，间接知识中孔子特别重视的又不是自然知识，而是社会知识，主要是道德和政治知识。

中国古代的科学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在先秦，这同西方古代哲学的第一次高潮古希腊哲学差不多是同时的。在中西的哲学高潮中都出现过一些素朴的本体论思想，在西方有水论、火论、气论、原子论等等，在中国有气论、道论、阴阳论、五行论等等，这些理论说明中西哲学家都很关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世界，都有着从本原上对世界加以探索的强烈冲动。与此相适应，中西思想家从外部世界也获得了大量科学知识。我国是世界上古代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准确完整的天象记录，从春秋以来记有日食 1000 多次，月食 900 多次，太阳黑子 100 多次，关于彗星的记录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这些以及其他天象记录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古代墨家的力学可以同古希腊的阿基米德的力学媲美。他们提出了杠杆平衡原理：标(力臂) $\times$ 权(砝码)二本(重臂) $\times$ 重(重物)。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十进位制的运算方式，《易经》中的八卦体系包含了二进位制的萌芽，对现代计算机的发明有启发作用。勾股定理(勾方+股方=弦方)是周朝的商高最早发现的。汉唐之间的《算经十书》是 10 部数学专著，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日本、朝鲜有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在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古代从不同知识领域来讲，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加辉煌，从整个知识领域来说，应用研究和技术的成就、影响也大于基础研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

中国古代思想家不重视分门别类的专科研究，这是同西方文化大不相同的。诚然，在西方，对自然和社会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而发展并繁荣起来的。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科学研究不免慢慢地落在后面，但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人已形成了专门研究的传统。古希腊不但出现了一批对基础科学进行专门研究的专家，如以数学研究著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几何学家欧几里德、力学家阿基米德等，而且出现了对多种基础学科进行分门别类专科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我们一般把知识渊博、博古通今的学者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按照这种理解，这种学者在古代是很多的，但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却是极少的，他不仅知识渊博，博古通今，而且已有明确的

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区别不同科学的思想，即科学分类思想，同时还进行了分类研究，分科讲授，他的全集就是由这些分科的专著和教材形成的。苗力田教授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由十卷构成，第一卷是方法论和逻辑学，第二至六卷是自然科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人体学……)，第七卷是形而上学(宇宙观)，第八、九卷是社会科学(伦理学、政治学、家政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修辞学、诗学)，第十卷是其他内容。这个《全集》完全是现代百科全书的一个雏型。这是典型的纯学术的基础科学研究，不能说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研究方法对近代实验科学的繁荣没有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之学极少这种纯学术研究，他们的著述都是为了解决某种实际问题而撰写的，涉及的领域虽然十分广泛，包括了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全部领域，但更多的是修身齐家经邦济世的人文社会知识，尤其缺少像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分门别类专科研究。例如人物众多、影响深远的儒家，他们的学说绝大部分是人文社会学说。孔子并非不谈自然，他的《论语》中多次谈到“天”，这个“天”有的地方是神，有的地方是自然，但他从不直接对“天”作出什么论断，而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或敬而远之的态度。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①《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②整部《论语》主要是三部分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儒家的两大分支孟子与荀子的言论谈到自然的当然比孔子多得多，但其言论的主要部分仍是人文社会知识，而且他们谈到自然时，很少谈自然本身，多谈自然与人的关系。例如孟子说：“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③荀子有些言论直接谈到自然本身，如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④这番话区别了无生物、植物、动物和人，但其目的还是为了说明人之尊贵。至于他说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⑤，其主题仍然是与人的关系。因此，像荀子这样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没有对自然进行多少专门研究。孔子办学，也有教育科目，有《六经》和《六艺》。《六经》是六种经典，即《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艺》是六种技艺，即礼(行礼)、乐(演奏)、射、御(驾车)、书(书写)、数(运算)，这12种教育科目有按学科进行教育的内容，但不是亚里士多德那种分门别类的专科教育。儒家以外的诸家在观点上各不相同，差别很大，但对实践与认识及其关系的态度却是大同小异的。

① 《公冶长》。
② 《述而》。
③ 《万章上》。
④ 《王制》。
⑤ 《天论》。

概括起来，中西文化在实践与认识及其关系问题上的特点是：其一，中国强调认识的实践性，西方强调认识的系统性；其二，中国强调认识的综合性，西方强调认识的分析性；其三，中国强调人文认识，西方强调自然认识。这些特点是它们的优点，也是它们的缺点。其所以是优点，是因为它们拥有部分真理；说它们是缺点，是因为它们有片面性。

第一，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文化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如果予以正确理解，并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实践与认识的统一，并不排斥实践与认识的区分。但中国文化所说知行合一则由于强调实践而流于忽视认识，特别是基础研究，甚至以实践吞并、淹没了认识。在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学习是为了实践，学习就是学习实践，他强调学以致用。他的教育学科除前面谈到的《六经》、《六艺》而外，学生学习也按专业划分：“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①这些都是实用学科或人文学科。《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②孔子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是身体力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③“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④这个“习”就是实习。学成了，“学而优则仕”^⑤。中国古代文化如此处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并形成了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冲击，其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后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把这一态度推向极端。他的“知行合一”说的本体论根据是心物合一。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⑥既然吾心便是天地，吾心一动就把天地改变了，因此：“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⑦。严格说，知行合一不能等同于实践与认识的统一。知行合一说有合理的一方面，即包含了实践与认识的统一，但它否定或忽视实践与认识的区分，则是片面的。且不说王守仁的心物合一说，仅就知行合一说本身来说，我们对这个传统也需要具体分析。

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即实践活动，无疑是人的最根本的活动，但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根本不同于动物的适应环境的活动，之所以能改变环境来满足人的需要，正由于它是由人的认识来指导的，而且这个认识必须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其科学性愈高，实践成功的可能性愈大，实践的效果也愈大；认识愈深入、愈系统，实践的效益也愈高。因此，决不可以因重实践而轻认识？认识从哪里来？从整体上说，实践出真知，认识归根到底来自实践，

^① 《先进》。

^② 《学而》。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子张》。

^⑥ 《传习录》中。

^⑦ 《传习录》下。

但决不可因此而轻视认识的相对独立地位，忽视那些似乎没有实用价值的基础学科的系统研究。我们当然要自觉地使实践与认识统一起来，但统一以二者的区分为前提，不能因强调统一而忽视了区分。反之亦然，区分也是以二者的统一为前提，不能因强调区分而忽视了统一。

知行合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但这一特点有合理性与片面性的两面，这两面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和后来的历史发展都有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践性，传统文化所说的实践虽然强调的是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而不是生产实践，但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有共同之处，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开来的文化因素之一。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脱离中国实践的“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使初期革命屡遭失败。后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走上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才胜利前进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说中国文化重视实践没有对此起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实践论》诚然是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也明显总结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因素。50年代，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道路，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后来，社会主义建设有脱离中国实践之处，导致了許多曲折与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领导下，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走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才走上了顺利前进的坦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实践的精神一致的。

重视实践是优点，但因重视实践而忽视认识、理论，否认认识、理论在人类文化中的相对独立的地位，急功近利，要求任何研究都要立竿见影，轻视系统研究，这样优点就转化成了缺点，这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有教训的。有一些基础科学在古希腊时代已经基本建立了，如形式逻辑、平面几何，近现代更是纷纷建立了基础科学，形成了科学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比西方毫不逊色，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几千年历史中却没有一门基础学科是中国人建立的，这是值得深思的。在现代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这在革命战争中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建国之后，仍然认为知识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轻视间接知识的系统学习和基础科学的系统研究，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便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文化大革命”。1972年，周恩来主张恢复和加强各高等院校的系统学习，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这种把实践极端化以至否定理论认识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实践主义”。当然，这种观点并非是对科学的实践观点的真正尊重。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的实践标准大讨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也纠正了“实践主义”的错误，摆正了基础学科的位置。但是，20年来，这种“实践主义”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逝，认为对实践的价值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的人仍然大有人在，

他们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实践主义”。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应该以恰如其分的论述。把真理夸大一步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历史的经验有利于帮助我们掌握好分寸。

第二，从整体来说，人类一切知识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总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这是因为整体与部分是不可分的，对一个事物的整个描述与部门分析也是不可分的，离开分析的综合是笼统、混沌的，并非科学的综合；离开综合的分析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片断。任何整体总是由一些部门组成的，任何部门同时又是一个整体，因此，知识的综合性与分析性总是相对的、一定程度的；这样，不同文化在知识的综合性与分析性上可能出现程度上的差异。由于中西文化在实践与认识及其关系上的上述差异，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知识综合性，西方文化具有较强的知识分析性。知识综合性或知识分析性强，是特点，是优点，但片面强调综合性可能导致分析性弱，片面强调分析性可能导致综合性弱，这样优点就转化成了缺点。中国文化就有这个问题，前面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分门别类的专科学研究少，整体的综合论述多，就是综合性强、分析性弱的一种表现。重视整体研究的传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也有助于中国科学的建设和发展。但如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轻视另一个方面，科学的发展将受到损害。历史教训不容忽视。

第三，从前面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在认识内容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确有重人文社会知识、轻自然知识和重内心反省体验、轻外部知识的特点，这是优点，也是缺点。重视人文社会知识的传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正是社会理论，即经邦济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因重视人文社会知识而轻视自然知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点，这是中国生产长期停滞的反映，又是生产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自从 19 世纪中国由于生产力落后遭受生产和科学发达国家的侵略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重文轻理的倾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自然科学知识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深入人心，甚至形成了重理轻文的社会心态，这当然是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但无论如何，几千年的重文轻理的传统是被纠正了。建国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得到重视。当然，应该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人文社会知识的意识形态性被强调得过分，其科学性受到了一定的损害，滋长了教条主义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由于自然科学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更加明显，社会上再度滋长了重理轻文的倾向。重理是对的，轻文是不对的，应该努力加以克服。道理很简单，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仅仅依靠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解决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我国理论界都有一些偏向值得重视。一是重实践轻认识的偏向，重实践是对的，轻认识是不对的。目前在哲学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哲学的对象不是作为整体的外部世界，而只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实践和认识，这样就把哲学从世界观变成了实践论和认识论，这就是重实践而轻认识的一种表现。二是重综合而轻分析，重综合是对的，轻分析是不对的。目前在哲学界也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过去是分析的时代，今天是综合的时代，这并不符合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科研究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新学科的出现如雨后春笋，分析性决不比过去低。提醒人们重视综合，不要陷入片面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把过去与现在区分为两个时代就过分了。三是重工轻理，重理轻文。这是社会上流行的偏向，不是理论界的倾向，是大家所熟悉的，不必多说。这些问题能妥善处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关于人际关系问题

人际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人群、个人与社会、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其中关键性的关系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关于人际关系的观点从实质上看就是一种价值观。

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马克思的三社会形态论，在第一个社会形态中人依赖于人，即自然经济社会，其价值观是整体主义；在第二个社会形态中人对人是独立的，但依赖于物，即商品经济社会，其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第三个社会形态中，人是独立的、自由的，又是互相依赖的，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或产品经济社会，其价值观是集体主义。有的学者把第一种社会形态看做传统社会，把第二种社会形态看做现代社会，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或转型之中。这种观点从这里引申出一个结论：我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是整体主义(包括建国后的集体主义)，已经过时了，转轨后的社会的价值观应该是个人主义，只有个人主义才适应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这种观点把三形态观生硬地套在中国社会历史头上是不对的。它认为第一社会形态的价值观是整体主义，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事实的，但它回避了所有制的区别，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划入传统社会，抹杀了传统的整体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经济基础上的根本区别，这就不对了。而且中国文化中不仅有整体主义，也有个人主义，整体主义也有不同类型，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际关系的几种主要观点及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